

光影长河中的永恒追忆

——周民震与他的电影传奇

□蓝海洋(壮族)



▲周民震。 资料图片

每到清明时节,心中总会泛起一股哀伤,那是对逝去亲人深切的眷恋与无尽的缅怀。而今年,在这个特殊的清明节来临之前,我怀着无比崇敬与感激的心情,参加了多场缅怀活动,深切追思于今年1月28日离世的著名剧作家周民震先生。

作为曾经多次采访过他的记者,我深知,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充满传奇的电影,每一个镜头都闪耀着理想的光芒,每一帧画面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。

周民震祖籍广西鹿寨县,是《甜蜜的事业》《春晖》《心泉》《彩桥》《远方》等众多电影的编剧。在他的创作生涯中,先后创作并发表了20部电影文学剧本,其中13部被搬上银幕,在国内外公映。他的一生与文学和电影紧密相连,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一路走来,用文字和影像记录时代风云变幻,展现中华民族的坚韧与伟大,为中国电影事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也成为壮族人民的骄傲,在中国电影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2017年,周民震荣获第三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身成就奖。颁奖词给予他高度评价:他是壮族儿女的骄傲,以剧作将广西勤劳善良的各族人民介绍给世界。

——题记

少年立志:龙城中学的红色启蒙

1932年,周民震出生于广西鹿寨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父亲周公谋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硕士,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同时,也是一位诗人;母亲出身中医世家,毕业于广州女子师范学校,是一位才艺双全的家庭主妇。在家庭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下,周民震自幼便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。父亲在家中吟唱自己创作的诗歌,母亲讲解古文,这些都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1946年,未满14岁的周民震考入广西柳州龙城中学。这所创办于1935年的学校,由思想进步的教育家高天骥创立。高天骥积极改革教学,倡导民主办学,允许各类进步思潮在校内讨论。学校公开演出抗日话剧《塞上风云》《魔窟》等,还支持、资助学生秘密奔赴延安投身革命。

在龙城中学,周民震深受进步思想的熏陶,积极参加由地下党员陈光等人领导的进步活动。陈光的教诲与赠言,让周民震坚定了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决心。课堂上,陈光讲述巴黎公社起义、俄国十月革命、“二七”大罢工等故事,激发了少年们的爱国热情。陈光还单独指导周民震和周民霖阅读高尔基的著作《母亲》,引导他们思考社会的不公与人民的苦难。在陈光的鼓励下,兄弟俩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籍,为日后的革命活动筑牢思想根基。

1947年10月,15岁的周民震和同学们共同成立了“奔流社”,并被推选为社长。“我们要通过文学,唤醒更多的人。”周民震在成立大会上坚定地說道。“奔流社”成员们以笔为武器,

创作小说、散文、诗歌,抨击当局的反动腐败,揭露社会黑暗,表达了解放区新生活的向往。他们出版的油印刊物《奔向太阳》,在学校和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。然而,这份刊物很快被国民党当局取缔。面对压力,周民震毫不退缩:“我们热爱文学,文学也能成为反抗压迫的有力武器。”

1948年7月,周民震正式投身地下革命工作,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。同年10月,周民霖加入地下组织“广西爱国民主青年会”。1949年1月,未满17岁的周民震经地下党员老师丘行介绍,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一名特殊的“不到年龄党员”。同年3月,年仅15岁的弟弟周民霖也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“那时我们年纪虽小,但心中只有一个坚定信念:跟着共产党走。”周民震回忆道。在党的领导下,兄弟俩秘密组织学生运动,传播进步思想,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。

战火青春:在革命斗争中淬炼成长

1949年,新中国成立前夕,周民震和弟弟周民霖面临人生重大抉择。当时,父亲在香港为他们安排了舒适的生活,甚至规划好了赴美留学的道路。但兄弟俩毅然拒绝,选择与家庭决裂,投身革命。

“你们真的要走这条路?”父亲周公谋严肃地问道。“是的,爸爸。我们已经决定了。”周民震语气坚定地回答。“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?这意味着你们将失去舒适的生活。”父亲的声音略带颤抖。“我们明白,爸爸。但我们更清楚,只有跟着共产党,才能拯救中国。”周民霖说道。“你们还年轻,不懂事。去香港,去美国,你们会有更好的未来。”父亲试图劝说。“不,爸爸。我们已经长大,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。我们不能看着祖国受苦,自己却贪图安逸。”周民霖补充道。最终,兄弟俩坚定地踏上革命道路,加入柳州人民解放总队,参与武装斗争,迎接新中国的诞生。

在游击队中,周民震担任中队政治指导员,参与了融水县城的解放战斗。在艰苦的环境下,他和战友们与敌人顽强作战。一次战斗中,部队被敌人包围,面对猛烈进攻,周民震和战友们毫不畏惧,利用地形优势展开殊死搏斗。周民震腿部不幸受伤,但他仍坚持指挥战斗,直至取得胜利。1951年3月,周民霖奉命带领连队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,奔赴抗美援朝前线。战场上的残酷景象和战士们的英勇表现,深深触动了他,也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素材。

文学之路:从苗山生活到银幕佳作

1956年,一次偶然的机会,让周民震踏上电影文学创作之路。电影艺术家夏衍来南宁讲学,周民霖在报告中听到“电影文学剧本”这一新鲜词汇,深受触动。当晚,他找到夏衍,表达了自己创作电影剧本的强烈渴望。“哦?你有故事吗?”夏衍微笑着询问。“有。我有一个关于苗族青年和壮族青年的故事。新中国成立前夕,他们遭受山霸残酷迫害,后来联合起来与敌人

斗智斗勇,最终报仇雪恨。”周民震详细讲述了这个故事。“很好,很有意思。生活是创作的第一源泉,你要多深入生活,体会人民的真实情感。”夏衍鼓励道。周民霖感激不已:“我会的,夏先生。谢谢您的指导。”

为创作《双仇记》剧本,周民霖深入融水苗山,与苗族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个多月,还体验了独特多彩的苗年。在苗山期间,他参与日常劳作,了解苗族风俗习惯,学会吹芦笙、跳踩堂,与苗族同胞建立了深厚情谊。这些亲身经历为剧本注入了鲜活生命力。《双仇记》发表后,周民霖并未停下创作脚步。为写好剧本,他再次深入苗山,采访众多复员军人和当地群众,了解他们的生活与困难。后来创作了电影剧本《苗家儿女》,讲述了苗族复员军人回乡,带领群众疏通河道,实现粮林双丰收的故事。剧本被著名导演陶金看中并投入拍摄,成为广西电影人创作的第一部电影。影片上映后,受到观众热烈欢迎,周民霖也在电影文学领域崭露头角。

文化担当:推动广西电影走向辉煌

1984年,周民霖担任广西文化厅厅长,任职期间大力推动广西电影制片厂发展,助力出品《周恩来》《血战台儿庄》等多部具有深远影响的影片。其中,《血战台儿庄》的拍摄意义非凡。

1985年,广西电影制片厂计划拍摄反映国民党正面抗日的电影《血战台儿庄》。在当时,这部电影的拍摄面临诸多风险,涉及两岸关系敏感问题。但周民霖凭借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强烈的文化担当,决定支持拍摄。为确保影片质量和影响力,他亲自参与剧本审阅和修改,多次与导演杨光远、翟俊杰探讨拍摄细节,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。

电影拍摄完成后,周民霖邀请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及相关领导审片。审片过程中,多数领导给予高度评价,认为这是一部史诗级战争大片。但也有少数同志担心影片会触及两岸敏感关系,影响两岸关系缓和。为争取更多支持,周民霖在《中国电影报》等报刊发表公开信,详细阐述电影的历史和现实意义,呼吁各界支持影片拍摄和公映。他指出,影片不仅展现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英勇表现,还为两岸关系缓和搭建了桥梁。

1987年,《血战台儿庄》在海内外公映,引起巨大轰动。影片斩获中国电影“金鸡奖”“百花奖”,以及文化部特别奖——“抗战奖”,还被评为新中国“百部爱国主义教育片”。更重要的是,它构建了海峡两岸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桥梁,促进了两岸同胞的交往与沟通。台湾当局购买电影拷贝版权,在当局高层内部放映,产生热烈反响,有力冲击了当局“不接触、不谈判、不妥协”的大陆政策。作为大陆首部正面宣传国民党抗日事迹的影片,《血战台儿庄》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,彰显了中华民族在抗战中的团结精神,为两岸关系缓和作出重要贡献。

终身成就:铸就电影编剧的传奇篇章

周民霖一生创作20部电影文学剧本,13部被成功搬上银幕。他的作品思想内涵深刻,民族文化特色鲜明。2017年,他荣获中国电影编剧终身身成就奖,这是对他艺术生涯的最高赞誉。

1979年,周民霖创作电影剧本《甜蜜的事业》,以喜剧形式反映“重男轻女”社会问题。为写好剧本,他深入南宁石埠,了解当地糖业生产情况,采访众多糖厂工人和农民。电影上映后,引发广泛社会反响,其中的歌曲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《我们的生活比蜜甜》等成为经典,传唱至今。

周民霖不仅是优秀编剧,还是电影艺术的探索者和实践者。他在创作中不断尝试新的表现手法和叙事方式,提升作品艺术感染力。他始终坚信“生活是创作的第一元素”,强调创作者深入生活才能创作出真实、生动的作品,这一理念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。

他的作品融入丰富民族文化元素,如苗族芦笙舞、壮族山歌对唱等,不仅增强了电影艺术表现力,还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多元文化。同时,他的创作紧密关注社会现实,反映时代精神,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,激励观众为美好生活努力奋斗。

怀旧中的甜蜜回忆:往昔岁月的珍贵印记

晚年的周民霖回忆人生经历,感慨万千。他曾在我的采访中,多次回忆在大苗山与苗族人民建立的深厚情谊,以及广西剿匪战斗中的艰苦岁月,在回忆中寄托对过去的怀念与对未来的希望。

“在大苗山的那段日子,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。”周民霖回忆道。他曾在大苗山雨卜寨居住三个多月,与苗族人民结下深厚情谊。他和苗族青年一起吹芦笙、跳踩堂,深入体验苗族生活。离开时,苗族人民依依不舍,数十位苗族青年一直将他送到寨子外的六甲河边,河边那块平台式巨石见证了他们的深情厚谊。“每次路过‘断肠石’,我都会坐在上面,寻觅和回味那咸咸的、甜甜的、已渗入巨石中的点点泪痕。”多年来,周民霖7次回到寨子探望朋友,每次路过“断肠石”,都要坐在上面回忆往昔。这段充满酸甜苦辣的经历,在他心中却有着难以言表的甜蜜,是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酿造的“蜜酒”,是民族情谊绽放的“奇葩”。

20世纪50年代初,周民霖参与广西剿匪战斗。为消灭狡猾的残匪,部队采取“远距离奔袭”战术,常常通宵急行军100多里,中途不能休息,还要绕山道,且不能埋锅造饭,以免惊动敌人。1950年初冬的一个夜晚,周民霖所在连队奉紧急密令,从融水和睦镇连夜奔赴罗城龙岸乡,必须在拂晓前赶到,突袭韦家恩股匪。任务艰巨,作为连队政治指导员,周民霖始终以身作则,带领战士们成功完成任务。他回忆道:“当时我就在想,人生最幸福的事是什么?能站一会儿就是奢望,连坐一下都不敢想,更别提躺了。因为站一分钟就能眯一小会儿,缓解疼痛难忍的腿脚。但那会儿,站一下都是奢侈。现在躺在沙发上回想那段经历,心里满是战胜艰苦岁月的喜悦、骄傲与得意,还有当下的甜蜜。”

晚年生活与精神传承:余晖照亮文化之路

周民霖的创作生涯跨越60多年,作品题材丰富多样,涵盖革命战争、民族生活、历史事件、现代生活等多个领域。这些作品不仅反映时代变迁,还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。

“生活是创作的第一元素。”这是周民霖始终坚守的创作理念。无论是《苗家儿女》《春晖》,还是《甜蜜的事业》,他都通过亲身经历和深入采访积累素材。“每次创作前,我都会深入生活,与当地人民同吃同住,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情感。只有这样,作品才会有血有肉,充满生命力。”周民霖回忆创作经历时说道。

他的作品在展现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,借助电影这一现代艺术形式,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。作品中融合壮、汉、苗等民族文化元素,以及抗战精神、革命情怀,让更多人领略到中国多元文化的魅力。“我希望通过作品,让更多人了解各民族文化,并将这些文化传承下去。”周民霖谈及创作理念时说道。

作为电影艺术的探索者和实践者,周民霖在创作中注重与团队沟通协作,不断尝试新手法、新叙事,追求作品最佳艺术效果。“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,需要编剧、导演、演员、摄影等多方面共同努力。”他说道。

离休后的周民霖,依然心系文化艺术事业。作为广西中华文化促进会创会主席,他密切关注广西文化艺术事业发展,积极为政府和相关部门建言献策。他多次提出加强文化艺术基础设施建设、培养文化艺术人才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建议,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。

2017年获得中国电影编剧终身身成就奖后,年事已高的周民霖仍关心中国电影发展,为年轻一代电影人提供指导和帮助。“希望他们深入生活,关注社会现实,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。同时,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,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。”这是他对年轻电影人的殷切期望。

周民霖用一生书写传奇。从少年时期树立革命理想,到青年时期投身文学创作,再到中年为电影事业拼搏,以及离休后致力于文化传承与创新,他始终以饱满热情和坚定信念诠释着信仰、担当与艺术。他的名字,将永远铭刻在中国电影史册上,成为后人敬仰的楷模。

(作者系广西中华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)